

“理性”与“感性”

——现代汉语诗学的文本分析

向天渊

(西南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新文学运动的初步成功以及白话文合法地位的确立,使得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理性诗学文本大量涌现。合理的结构、完整的内容、恰切的论据、清晰的描述,以及定义、比较、推论等方法的具体运用,是“理性文本”的基本特征;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体现了现代汉语文学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印象的“感性文本”的大规模减少。随着现代汉语诗学的发展,理性文本与感性文本在总文本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理性文本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就是在被感性文本作为最后据点的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也逐步被理性文本所蚕食。这一过程潜在地反映了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在现代汉语诗学中话语地位的变化与转换。

[关键词]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感性文本;变化与转换;传统与现代;话语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2)01-0035-05

Rational Texts and Perceptual Texts

——An Analysis of the Texts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etics

XIANG Tian-yuan

(Chinese Poetics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715,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preliminary success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sition of Vernacular Movement, the rational texts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etics emerged largely.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rational texts are the reasonable structure, complete content, proper argument, distinct description as well as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definitions, comparisons and inferences. However, in spite of the increase of the rational texts, it didn't mean that the perceptual texts had been extensively decreas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etics, the overall proportioning of the rational texts and the perceptual texts is undergoing a constant change. The scop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 texts is getting enlarged so that in the realm of poetic criticism and research where the perceptual texts take the last stronghold has been encroached by rational texts. The process of such a shift implicitly reflects that western poetics has established the discourse authority over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s in the modern Chinese poetic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Poetics; rational texts; perceptual texts; change and transform; traditional and modern; discourse authority

从长时段历史观来看,中国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是“启蒙”,“救亡”只是一个全民性的短期行为。按照康德的说法,“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1](P24)}对人类是如此,对一个民族也应该如此。

而且康德“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1](P24-25)}由此看来,启蒙与理性也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启蒙呼唤理性,理性促进启蒙,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新文学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运动

收稿日期:2011-12-07

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和合诗学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向天渊(1966—),男,汉族,重庆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诗歌与诗学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渴求理性精神,而且其理性化倾向也确实以不可逆转的方式逐步增强。这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合理性。新文学理性精神的逐步增强,不止限于批评与学理层面,在创作方面也是如此。当然,批评、理论的理性化有利于汉语诗学的现代化,而创作上理性化倾向超过一定限度,则会造成公式化与单一化的恶果。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创作问题,着重从诗学文本的理性存在与感性存在这一视觉,考察现代汉语文学批评与理论,同传统诗学以及西方诗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

梁启超自述其“新文体”的特征时,颇为自得的是:“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P86)}“新文体”之所以具有魔力,除了思想上的震撼力之外,从文本的角度考虑,逻辑理性的成功介入及其与情感体验的完善结合,也是重要的原因。当然,梁氏新文体以政论文为主。在诗学著述上,20世纪的头十年,已经出现一批比较标准的“理性文本”: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论新学语之输入》、《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尽管充满激情,但都条理分明、逻辑清晰,是颇具情感色彩的理性文本。此外,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文学总略》都能承袭古文经学及清代朴学之精神,理智、冷静地考辨文学的本质与发展问题,也属于典型的理性文本。辛亥革命之后,理性文本更见丰富,但基本上仍以文言写成。新文学运动取得初步成就之后,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理性诗学文本才大量涌现。

《新青年》从四卷一号(1918年1月15日)起开始用白话和新式标点,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等随即以白话发表诗学论文,如胡适《论小说与白话韵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钱玄同《新文学与今韵问题》、《论注音字母》,周作人《陀斯妥夫斯奇之小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人的文学》,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戏剧改良各面观》、《再论戏剧改良》,等。其中大多属于理性文本。合理的结构、完整的内容、恰切的论据、清晰的描述,以及定义、比较、推论等方法的具体运用,充分地显示出同传统诗学中

大量诗话、词话、曲话以及小说评点等感性文本的巨大反差,这些可以说正是“理性文本”的基本特征。

1920年1月1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要求小学一二年级国语从当年秋季起用白话取代古文,同年3月,教育部又要求小学各年级一律废除文言教科书,白话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上被打开的潘多拉之盒,两千年垒就的文言金字塔几乎毁于一旦,随着“文言”这一传统文化根基的动摇和坍塌,中国文化古代与现代的分水岭也就此正式形成。白话取代文言,虽然有损于汉语的诗性精神,但却加强了汉语的理性力量。这是汉语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得与失的选择。这里,我们无须介入对这一选择本身得与失的讨论,我们只关心白话文取得合法地位之后,进一步促进了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的发达这一客观事实。

首先,众多的文学论争,催生出大量短平快式的理性文本。当现代汉语诗学成功地夺取了传统诗学的统治地位之后,内部又发生争夺话语权威的论战。论战时期发表文章的第一目的是迅速击败对手,最有效的手段是攻其要害、不及其余,因此短小、快捷是论战型文本的基本特征。但仅有这两点还不足以击倒对手,还需要有强大的逻辑力量。即使是论战中出现的随感录、杂感类诗学文本,也因为逻辑性和针对性的加强,很大程度地消弥了传统小品文的主观与感性色彩,跨入了现代理性诗学文本的行列。比如,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由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发起,鲁迅、茅盾、冯雪峰等相继加入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就出现了一批这样的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都被收录到《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二》之中。这些文本虽然存在意气用事、有所偏激的情况,但其内在的逻辑性是比较充分的。

其次,一系列长篇论文的发表,更充分地展示出理性文本强大的逻辑推衍能力。长篇诗学论文是古代诗学中比较缺乏的文本类型,但自从文学革命成功之后,这种文本相继出现。比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就是一篇五万字的大论文,由十个部分组成,线索非常明晰,其突出的理性色彩又非一般短小文本所能相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门外文谈》等是鲁迅为数不多的长篇论文;梁实秋二十年代中后期也写出了一批长篇论文;茅盾等人的“作家论”大多也具有较长的篇幅;收入“百科小丛书”的一些诗学专著,从篇幅、内容上看,也可

视之为长篇诗论。而三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的“导言”，则是系列长篇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第一个十年间中国新文学各门类的综合研究。

第三，一批经过较长时间思考的现代汉语诗学专著的出现，显示出理性文本在阐释重大文学现象和建构理论体系上的巨大优势。现代汉语诗学专著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批评文集，二是文学史、批评史专著，三是文学概论类著作，四是文学理论译著。译著的结构、观念都来自国外，其理性精神虽然对现代汉语诗学有所影响，但毕竟不能作为现代汉语诗学理性文本的代表。^①大多数批评文集严格说来算不上专著，只是单篇论文的结集，虽然一定程度地体现了批评家的某种思想或观念，但内在结构比较松散，系统性并不鲜明。倒是二、三两类著作，显示了比较充分的理性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的文体对客观性、真实性有特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文学史、批评史以及文学理论等学科的基本观念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西方，在引进观念的同时，也引进了观念所包含的理性精神。

二

尽管现代汉语诗学话语及文本已经具有比较浓厚的理性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感性文本会迅速地大规模减少。现代汉语诗学的“感性文本”，是指比较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汉语文学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印象的诗学文本。一般说来，这种文本的情感性、直觉性、鉴赏性、随意性等特征比较突出，相对理性文本而言，在逻辑性、系统性、严肃性等方面则要淡薄得多。

这些特征最充分地体现于各种诗论类文章之中。诗是各类文学体裁中情感性、体验性最强的类别，诗歌创作时神秘的灵感现象，就是赋予这种情感性、体验性最为独特的方式。诗的本质也因此最难把捉，而批评诗的最好方式似乎也只能是印象式或鉴赏式的。诗，在新文学发展中倍受批评家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文学革命运动中最难攻破的堡垒，另一方面还由于它是新文学中取得成就最小的文体。新诗的生存依据、现实处境、发展趋势等问题，都是新诗批评家所关心的内容。但由于缺乏一套能够言说或者说批评新诗的有效话语，批评家们往往借用传统诗学话语和话语方式，这就使得现代

汉语诗论、诗评类著述大多仍以感性文本的方式存在与发展。

胡适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选录了七篇诗论文章：胡适的《谈新诗》、《寄沈尹默论诗》、《〈尝试集〉再版自序》，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周无的《诗的将来》，郭沫若的《论诗通信》，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其中理性色彩最强的是被朱自清称赞为“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②的《谈新诗》。该文的副标题是“八年来一件大事”，但这只标示胡适对新诗事件的一种价值评判，并非意味着文章是在作历史性的描述，所以此文虽然涉及新诗发生的必然性、新诗有诗界革命的神气、新诗的音节等问题，但内在联系并不特别紧密，所举例证也以自己的诗作为主，颇有为自己喝彩的嫌疑，其感性特征相当鲜明，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应有的理性色彩。周无、俞平伯两人的文章，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但周无对新诗未来的推测，俞平伯关于“怎样使新诗的基础坚固”的意见，又都带有突出的主观性。康白情干脆明说《新诗的我见》是写出来发表他“对于新诗的直觉的”。其余三篇文章，两篇是书信，一篇是序，论及的都是点滴性的诗学问题，可以说是比较纯粹的感性文本。^③

上述七篇文章是胡适在1935年才挑选出来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胡适毕竟受编选体例的限制，割舍了很多重要的论诗、评诗的文章。一般说来，探讨诗歌原理、评价诗歌现象的论诗文字，相对要理性化一些，而批评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诗文字则感性化倾向更为突出。即使是同一个批评家的文章，这种区别也非常明显。比如，二十年代的闻一多，既写有理论性、学术性很强的《诗的格律》，又作有《〈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冬夜〉评论》等批评性的文章。但两相比较，评诗文章的情感性、主观性、印象性都要鲜明得多。

如果说闻一多的艺术家气质和诗人激情，很大程度地决定了他的诗评文章的感性倾向，显得较为特殊的话，那么，在追求平淡而且以“宽容”为批评原则的周作人的文章中，同样存在诗论理性化与诗评感性化的差别，则说明这种区别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其他批评家的诗论、诗评文章，从1920到1937年，纯粹新诗研究的专著、论文集就有三十来部之多，^④更不用说散见于各种报刊、文集的大量诗歌

批评文字。但就是专著,除却少数颇具学理性之外,大多以概说、浅说、讲话、讲义、诗谈等形式出现,^[4]但主观性、印象性仍然非常鲜明,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承袭了传统诗话的感性基因。

现代汉语诗学中的序跋类文章,大多也属于感性文本。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写的序跋,往往以直觉感悟或切身体会的方式批评诗文、提出某种观念,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与情绪化倾向;即使是长期浸润于西方文化中的胡适、叶公超、徐志摩等人的序跋,也仍未彻底摆脱传统的影响。这使得现代汉语诗学中的序跋类文章,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结构上总免不了做一些客套或友情方面的交待,观点的提出大多也还是凭直观感悟、个人体验的方式,有时甚至以对作者的评价取代了对诗文本本身的评价,谈不上条理分明的具体论证。如周作人的《〈扬鞭集〉序》、《〈竹林故事集〉序》、《〈桃园〉跋》、《〈杂拌儿〉跋》、《〈现代散文选〉序》等,我们完全可以不把它们看成评论性的文章,只当是抒情美文来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周作人的序跋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是说,他提出观点的方式,是抒情的、美文的。对如何作序跋,周作人有自己的见解:“做序是批评的工作,他须得切要地抓住了这书和人的特点,在不过分的夸扬里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才算是成功,跋则只是整个读过之后随感地写出一点印象,所以较为容易了。”^{[4](P238)}

用这一标准,检视周作人自己的序跋,虽不完全吻合,但也偏差不多。“跋”是“随感地写出一点印象”就算合格,“序”则不易操作,难点在于既不能“过分的夸扬”,又须“明显地表现出”批评观点来。其结果,或许也只能如周作人那样,于海阔天空、古今中外的闲谈中,发表自己的看法。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出现过印象主义批评,其发生重要影响始于1936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署名刘西渭的《咀华集》,1942年1月,同一出版社又推出该批评家的《咀华二集》,使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当然,印象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其最初出现是在西方,其理论与实践的高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且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密切相关。当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不久,中国也引进了印象主义批评,不过这引起了二十年代中期已经由浪漫主义转向古典主义的梁实秋的激烈批判。他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专

列“印象主义”一小节,批评“法朗士的本领乃是‘在文学杰作中作灵魂的冒险’,这‘灵魂的冒险’,便是印象主义最适当的注脚。”^{[5](P43)}并指责:“印象主义便是浪漫主义的末流”,^{[5](P43)}印象主义批评,是与古典的理性的判断的批评相对立的,浪漫的感情鉴赏的批评之一“极端的例子”,印象主义批评家们“不但没有客观的标准,除一己之性格外并无主观标准之可言。”^{[5](P45)}当然,清算西方印象主义的目的是批判当时中国的印象主义,因为在梁实秋看来“中国近来文学批评并不多见,但在很少的文学批评里,大半即是‘灵魂的冒险’。只要你自己以为有一个灵魂(其实不是灵魂,只是一副敏锐的神经和感官罢了),就可以到处去冒险。”^{[5](P45-46)}梁实秋的批判也许过于苛刻,但他对印象主义批评特征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印象批评是浪漫的趋势的一部分,其主要原理即在推翻理性的判断力,否认标准的存在,其影响则甚大。可以转移全部的创作文学的趋向。”^{[5](P46)}

既然印象主义批评有如此特征,运用这一方法所产生的文本,自然属于感性文本。二年代初不少以“随想录”、“读后感”形式出现的文学批评论文,就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甚至太过随意以致产生严重的滥情倾向。曾经留学法国的李健吾,运用的是比较纯正的印象主义批评方法,其含英咀华式的批评,将自己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但李健吾的批评文章仍然是印象主义批评惯常使用的随笔性文体,而且主要运用象征、比喻等手法,对作品进行整体的直觉性的把握与关照,较少分析归纳和逻辑推断。他对《边城》、《雷雨》、《八月的乡村》、《画梦录》等一批名作的批评都是如此。这也与他对“批评”的理解有关:“创作家根据生料和他的存在,提炼出来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为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6](P310)}

三

中、西方传统诗学话语方式存在着直觉、感悟与逻辑、分析的区别。而中、西方传统诗学文本也存在着感性与理性的区别。话语方式决定文本的存在形态,反过来,文本的形态既使该种话语方式得到充分的展示,又禁锢着这种话语方式,阻碍着它的演变。中国古代诗学独特的话语方式制造出特殊的诗话、词话以及诗文评点等话语文本。但是,到了清代中

叶以后,这些文本又反过来禁锢古代汉语诗学话语,成为它向近现代理性化转型的绊脚石。直到20世纪初,在欧风美雨的猛烈冲刷与文学革命的强力爆破之下,传统感性诗学文本才逐步缩小自己的地盘,出让给理性诗学文本。当然,这种退让在小说批评方面最为迅速,在散文批评、戏剧批评方面也比较彻底,但在诗歌批评方面则显得既缓慢又不彻底。这应该不是新文学运动者所乐于看到。由此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完全可以超越个人、群体乃至整个民族的有意识的阻遏行为,继续以潜在甚至明显的方式存在着。

所谓中、西传统诗学文本存在感性与理性的区别,只是就其主体方面而言,并非截然、彻底的划分。设若中、西诗学真是界限分明,犹如天堑之隔,中西诗学之间也就不会发生相互的影响与交流。实际上,中国古代诗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理性文本,西方同样也不缺乏感性诗学文本。只是,在西方理性文本与感性文本处于互相竞争的地位,在竞争中都得到了发展;而在中国,除了魏晋时期产生了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理性精神比较浓厚的诗学文本之外,唐宋以后感性文本的大肆流行,几乎挤占了理性文本生长的空间,压制了它的发展。尽管现代汉语诗学的理性文本,主要是在受到西方诗学话语影响之后发展起来的,但也不能说与传统诗学话语和理性文本绝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现代汉语诗学的理性文本是对传统诗学中被压抑因素的张扬,或者说,传统理性文本虽然枯萎,但并未消亡,假以适当的文化氛围和理论支持,它也会再次焕发生机。不过,我们也得承认,现代汉语诗学的理性文本毕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已经与古代汉语诗学中的理性文本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逻辑性、清晰性、完整性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最后,我们还须认识到,随着现代汉语诗学的发展,理性文本与感性文本在总文本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理性文本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宽,就是在被感性文本作为最后据点的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也逐步被理性文本所蚕食。就诗歌理论研究领域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著作,而且理论性、系统性日益增强。当然,这也与研究者们对西方诗歌理论逐步熟悉,采用西方诗学术语不断增加密切相干。王希和、傅东华、朱光潜等都是凭借熟知西方诗学,写出具有鲜明西化色彩的诗论专著,而

且由王氏的《诗学原理》,到傅氏的《诗歌原理ABC》,再到朱氏的《诗论》(三十年代初写出,抗战初作修改,1943年出第一版),学术性、系统性逐渐增强,而且对西方诗学的依赖越来越弱,独创性则越来越鲜明。与此同时,对新诗文体特征的研究,对新诗历史的描述与反思以及对新诗创作方法的探讨等,也在不断加强。比如,影响较大的就有胡怀琛的《小诗研究》、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孙俔工的《新诗作法讲义》、丘玉麟的《白话诗作法讲话》、石灵的《新诗歌的创作方法》等。诗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必然会影响到诗歌批评,因为这些研究往往是以旧诗与外国诗作为参照系来进行的,在区别中建立起新诗自己的文体特征,文体的确立,必须依靠一套特殊的话语,这套话语的逐步成熟,也就意味着新诗理论日益摆脱传统的束缚,显露出初步的逻辑性与系统性,新诗批评正是以此为支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在文本上的表现,也是理性化趋势日益增强,从胡适、周作人到朱湘、朱自清,再到梁宗岱、叶公超、胡风等的诗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注释]

- ① 比如,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章锡琛译日本学者本间久雄著《新文学概论》,就是这样的诗学著作。它的体系性较强,对二、三十年代我国不少文学理论著作都发生过影响。但该书的结构也非本间久雄的原创,本间久雄在序中说:“我在本书中,引证泰西许多权威著述极端的。”并将前后两编所受西方影响的书籍列举出来。
- ② 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59页。
- ③ 参见潘颂德《中国现代诗论40家》,附录:“中国现代新诗研究专著目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 ④ 郭绍虞曾用“以论事为主”和“以论辞为主”来区分北宋、南宋诗话的两种倾向,参见《清诗话·前言》,第3页。

[参考文献]

- [1]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A].历史理性批判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 朱自清.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C].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 [4] 周作人.《燕知草》跋[A].周作人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 [5]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A].梁实秋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 [6] 李健吾.《咀华集》跋[A].李健吾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谢明子]